

中美互动中的跨文化容通问题

——从美国华裔说开去^①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venes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alking from Chinese American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储诚志

摘 要：本文以骆家辉作为华裔驻华大使的特殊身份及其所经历的中美之间跨文化碰撞与冲突作为分析实例，提出两国之间的跨文化容通问题。文章认为，跨文化容通是构建和发展国与国之间和谐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因容通不足造成的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主观误判是导致彼此间不同层面交际障碍或关系摩擦的重要原因。为实现“把中美关系搞好”的根本目标，需要以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思维对中美之间各层面、各类型的交流互动进行基础性、人文性的学术探索，从而构建两国之间跨文化容通的学术基础，在双方的人文传统、价值体系、思维习惯和行为惯式的系统之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彼此，从而减少隔洋相看时常出现的认知盲区和误解、误判。循此认识，文章还通过语料调查分析了“美籍华人”、“华裔美国人”和“ABC”这三组概念所表达的有关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不同的认知意涵，揭示了三者所关联的跨文化差异、语用分别及华裔思维代沟，讨论了正确认识这些差别对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美互动 跨文化容通 美国华裔

一、导言：跨文化容通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双边关系。在 2017 年 4 月访美期间与美国

^① 本文的部分内容据作者在四川省美国研究中心 2016 年度课题立项发布会暨美国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修改而成。感谢李成坚、俞森林两位教授对确定演讲题目和内容提供的重要意见以及梁霞、贾钰、张英宇诸同人对部分章节提供的很好的阅读反馈。

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因为“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① 习近平的这些表述是对中美关系大局与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和清晰定位,得到了特朗普的热情回应,从而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建设性基调,获得国际舆论普遍的积极评价。^②

多年以来,发展与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沟通理解、互利共赢成为两国交往的主体特征。但是,在合作共赢的互动主流之中,也时常伴随着两国间各种各样的纷扰与摩擦,成为深化两国关系的障碍。如何减少摩擦,消除障碍,增进合作,“把中美关系搞好”,既需要政治领袖的智慧与勇气,也需要学术上的认真思考与审辨和实践中的妥善应对。

就其属性而言,造成两国之间各种层面交往互动中产生纷扰与摩擦的原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利益诉求的冲突,其次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再次是文化的差异。这三者之中,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通常都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双方一般都有明确的主张,都清楚纷争的起因;矛盾的产生就是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或各自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主张。两国间的利益纷争常常集中于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比如贸易纠纷、疆域和主权争议、知识产权摩擦,等等。这类问题很多时候可以诉诸国际法来进行是与非或正义与非正义的辩论和判断,或者按照国际及双边条约通过外交谈判进行解决。意识形态对立的典型例子是上个世纪国际政治中两大阵营间的长期冷战。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Huntington 1996)。中美之间虽然还有“主义”的不同,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接纳,这种不同已基本不构成彼此交往互动的根本障碍,尽管在知识界一直都有强调从意识形态的差异来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声音。^③

^① 见新华网2017年04月07日报道《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http://us.xinhuanet.com/2017-04/07/c_1120769372.htm。2017年4月10日最后访问。

^② 参见王新萍、黄发红、张朋辉等:《指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17年4月10日第3版。

^③ 参见后文二、三节。

造成两国间矛盾冲突的第三个原因，即文化的差异，涉及各自社会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定式等方面的人文规约与准则。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人文基础形成于各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积淀与规约性选择。与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相比，文化的差异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规约性的社会文化虽无处不有，却常常以一种隐性的、潜规则的方式存在并发生作用，因而不易明察，就像语言的结构规则一样。两种文化间的差异虽然在不少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但若隐若现、似无却有的情况非常常见，身在其中的交际双方常常有不少认知的盲区；这种盲区很多时候体现为对对方文化的无知，但对自身的文化也常常会不知其然及其所以然，^① 认知盲区与交际误判和摩擦常常由是而生（Samovar et al. 2015）。其次，即使对对方的某种文化形态有确切的感知，因为自己固有的人文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即文化成见与偏执），对所感知的对方文化可能会做出不符合对方实际情况的理解和评判，从而造成跨文化误解与误判。^② 再次，不同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排他性，但在更多的方面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而且可以互相吸收乃至融合，使彼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③ 这与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具有的强排他性很不相同。^④

不同文化共存互容的情形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普遍存在，从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和谐共处，到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现代国际社会的深度西化，都是异质文化交融共处的典型例子。至于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得益于其对不同文化“熔炉”般的开放接纳与深度融合（Fukuyama 1992）。但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大到上世纪后期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小至在中国参加商务宴请喝不喝酒、怎么喝酒之类的纠结，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随处可见（Samovar et al. 2015；Dunne et al. 2016）。两种文化在现实中相遇，是发生碰撞和冲突还是能够和谐共存甚至彼此交融，主要取决于交际双方所秉持的跨文化态度和对对方文化准确认知的程度。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

① 比如鲁迅、胡适通过反思所揭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

② 比如一些西方中文学生认为“愚公移山”的不可理喻。

③ 因此，我们不认同亨廷顿的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样绝对化的文化冲突论（Huntington 1996）。

④ 两方争利，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必有所失；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赢家坚持输家就得放弃。

误解误判会给两种文化或两国的交往互动带来矛盾和冲突,对异质文化缺少宽容的胸怀则会加剧这一矛盾和冲突。

不同文化和谐共处的基本前提是交际双方的跨文化容通。“容”就是宽容,是交际双方的文化平等观念和在态度上对异质文化的尊重;“通”是了解、通晓,是在知识上对对方文化和跨文化差异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只有具备宽容的跨文化态度和准确充分的跨文化认知,减少乃至消除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误判,才能减少或避免两国和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矛盾。^①

观察中美两国交往互动的诸多实践可以发现,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主观误判是造成彼此之间不同层面交际障碍或关系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②为减少并力求避免彼此间隔洋相看时常出现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朝着两国元首共同确立的“把中美关系搞好”的目标努力,需要以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思维对中美之间不同层面和类型的交流互动进行基础性、人文性的学术探索,以构建两国之间跨文化理解和融通的学术基础。对中美之间跨文化交际的人文认知的基础研究当属美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学术方向。

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交际误判给中美交往所带来的问题和损害相当普遍,从日常交流中的一个误会和洋相,到一部电影的海外推介、一场文化交流活动的失败和语言课程的一个挫折,甚至到一些严重的外交争端,在不同层面都时有发生。由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带来的交际问题与两国关系中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外交领域的时事性问题不同,通常与国际事务的正义性考量关系不大,一般不适合于进行是与非的价值判断,而是应该在双方的人文传统、价值体系、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的系统之中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彼此,从而达成跨文化的认知容通。只有这样,很多误判和摩擦才有可能得以避免。

下面将通过实例分析来具体考察中美交往中的跨文化容通问题,展示前面提出的思考和主张,讨论通过跨文化容通来促进中美关系的着力点和基本路径。

^① 在其文明冲突论的体系中,亨廷顿对于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误判的存在及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的可能性缺少充分的考量,这与他提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主张不无关系(Huntington 1996)。

^② 语出《易·贲卦·彖传》。

二、骆家辉大使的赴任风波

我们先从美国华裔政治家骆家辉（Gary Locke）说起。骆家辉是第三代的美国华裔移民，他的祖父于19世纪中叶从中国的广东台山移居美国。他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接受完整的美国教育之后，当过律师，后来从政，担任过华盛顿州州长和美国联邦商务部部长，在州长和部长任上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做出过突出成绩。2011年，他被奥巴马总统委派到中国来担任驻华大使。

与其他各任美国驻华大使不同，骆家辉的华裔身份使他的言行作为从赴北京就任的路上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媒体和大众的特别关注。让大家意外的是，他衣着休闲，轻车简从，背着背包，坐着飞机经济舱前往北京赴任。这样的简朴做派与中国民众惯常认知中高官上任的应有排场很不相符，结果在中国迅速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有人在《光明日报》上专门发文，指责骆家辉这样做是一种“阳光下的阴谋”，带有“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意在“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碎裂[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给中国“带来美国的新殖民主义”。^①

《光明日报》该篇文章对于骆家辉简朴就任的这种批评，立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② 有关问题及其影响值得从外交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进行认真分析。就本文的跨文化交际角度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思考。第一，在一般知识层面，这是对美国政府有关公务旅行的基本规章缺乏了解。根据美国的《联邦旅行条例》（Federal Travel Regulation），政府官员（包括驻外大使）飞机旅行乘坐舱位的等级选择主要是根据安全、保密和身体状况等因素来考量，如果这些因素都不是问题，即使是高级官员，坐经济舱也属正常选择。^③ 第二，在大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式

① 见相晓冬《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新浪网2011年8月16日，<http://news.sina.com.cn/pl/2011-08-16/103122998581.shtml>。2017年3月12日最后访问。

② 参见《华盛顿邮报》2011年11月28日文章：Gary Locke is star in China as first U.S. ambassador of Chinese ancestry（记者Keith Richburg）。中国知识界的批评意见可参看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的《“奇妙”的文化逻辑》一文，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45.html>，2017年3月20日最后访问。

③ 相关规章文件参见美国政府日常事务管理办公室网站<https://www.gsa.gov>。2017年3月20日最后访问。

上,中美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美国,凸显身份地位的排场意识和面子思维虽也都有,但与在中国相比要相对淡薄。除非是十分正式的场合,衣着饮食通常不甚讲究,消费更偏重于实惠与个人兴趣,而非别人眼里的排场与面子。骆家辉的简朴赴任,较大可能是他潜意识里的美式思维与行为习惯使然,而非针对中国的官场习惯有意进行的行为设计。^①第三,换个角度来看,骆家辉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就任但却未能在衣着行为上“入乡随俗”地做出相应调整,从而避免造成一些中国大众的认知不适,以及给部分官员带来因对比强烈而产生的不快之感,这在客观上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际失误。如果所引起的舆论风波不是他所想看到的,他作为外交大使应该可以事先做好这方面跨文化思维认知的功课,以减少甚至避免纷扰的发生,从而能够专注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真正要务。

因此,这一由骆家辉大使简朴就任带来的外交纷扰,其深层原因在于跨文化认知盲区的存在和宽容心态的缺失,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问题。设若骆家辉的批评者熟悉美国的思维常情与行为习惯,并能换位思考从而加以体认理解,那么对骆家辉的意识形态式批评及其所造成的广泛影响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骆家辉能够充分体认中国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在非原则性的衣着言行上能够入乡随俗进行调整,相应的问题也不会出现。

中美交往中的不少纷扰都是如此:事情本身并不是原则性问题,在一些人那里之所以成了原则性问题,恰恰是源于他们的跨文化认知盲区和主观误判,在于他们跨文化容通能力与素养的缺失。那些跨文化的差别虽然也可能关乎意识形态,但很多时候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常体现,既无是非对错之分,也无主观恶意之嫌。对于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和胸怀进行跨文化的理解、体认与容纳,而非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的批评指责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否则,就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本不该有的纠纷与摩擦,造成社会成本的无谓消耗,并且干扰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大众现代文明素养的健康养成,形成一种伤人自伤的结果。成就外交须观乎人文,骆家辉的上任风波为美国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典型案例。

^① 如果不是习惯使然,骆家辉作为大使应该可以找到安全与保密方面的理由而坐头等舱或商务舱飞往北京。

三、华裔身份与中美外交

在中美交往中，美国华裔的角色很特别。他们是连接中美两国间最自然的纽带，是中华文明在美国的主要传播者；将美国的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美国华裔实现的。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美国华裔生活于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是中美跨文化融通最具体、最全面的实现者。^①华裔在中美交往中的突出作用自不待言。因此，对华裔的准确理解，特别是对美国华裔的身份定位与文化认同的恰当认知，也是中美之间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的认知偏颇与缺失，会直接造成两国间的交往障碍。

我们还是从骆家辉说起。对于骆家辉的大使之任，中美两国都认可他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的实质性成绩。此外，他也秉持美国政府的惯常立场，在一些场合对中国的人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批评性意见，还对个别政治异议人士提供过帮助。他的这些言行在中国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在公众和知识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在他2014年离任大使之时，中国新闻网以《别了，骆氏家辉！》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他作为华裔却站在美国的立场对中国说话，将他称为“瘟神”来送他离去。^②此文一出，不仅在中国国内立即引发网民热议，国际上诸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也都密切关注，^③美国在全球事务领域有广泛影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甚至以“以种族主义告别骆家辉”为题组织多位学者进行评论。^④对于中国新闻网文章的观点，这些国际媒体都高度一致地表示否定，对作者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语方式批评尤多；在中国，网民热议中的多数声音也是对文章作者的看法和态度表示反感。^⑤

中国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虽然引发的议论纷纷纭纭，时间上至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年，但是，造成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思考。这样的事件

① 当然，这不是说华裔在跨文化融通方面就一定都做得很好。

② 见王平《别了，骆氏家辉！》。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7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27/5892576.shtml>，2017年3月12日最后访问。

③ 参见 America's Departing Ambassador: No Love Lost. *The Economist*. March 8, 2014 和 A Parting Shot at U. S. Ambassador, Inspired by Mao,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14.

④ A Racist Farewell to Gary Locke. *Foreign Policy*. March 3, 2014.

⑤ 参见天涯论坛 <http://bbs.tianya.cn> 上的有关讨论留言。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虽然不像政治、经济或军事领域的国际纠纷那样直接明显，但其带来的伤害是广泛和深远的。在中国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对有关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以汲取教训，是构建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中外和谐互动的国际环境之所必需。

《别了，骆氏家辉！》一文在其他方面的是非曲直另当别论。这里着重思考的是文章作者对骆家辉的批评因其华裔身份所采取的特别角度和关注点。在文章中，作者指责骆家辉“黄皮白心”，作为华裔却站在美国的立场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且“不认祖先的文字”。文章甚至搬出他的祖宗来进行中国式责骂：“您祖上要是知道，可要把您逐出门户了。”可想而知，这样的粗暴责骂是因骆家辉的华裔身份而来，如果骆家辉与其他各任美国驻华大使一样没有与中国的血缘关联，当不会遭到如此批评。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深层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彼此对华裔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巨大认知差异。

正如《别了，骆氏家辉！》一文所提及，中国大众所秉持的常规性思维是“四海炎黄是一家”。对于海外华裔，既有对自家人般的亲切热情，也有对自家人般的当然希冀。骆家辉虽为第三代华裔移民，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接受教育，并且是代表美国政府出使中国，但既然是到自己的祖籍国来，从一般百姓到知识分子，不少中国人对他都有一种游子归来的自然情感；同时在潜意识里也隐含着祖国和同胞亲人对漂泊在外衣锦归来的孩子的真切期待，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希望他在处理中美事务中能够体现出对“祖国”利益的维护，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利益关切和话语表达等等方面表现出对血缘同胞的情感认同和实际关照。当然，对于华裔子弟说中文写汉字的中文能力，在中国同胞心目中通常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

但是，骆家辉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认同与他的中国血缘同胞的潜在认知明显不同。他并不遮掩在这方面的自我理解，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百分百的美国人”，虽然也“为自己的华裔血统感到骄傲”，但他清楚地表示自己“代表着美国政府和人民”；在文化理念上，他也坦率宣称自己“为美国对整个世界带来的伟大价值观感到骄傲”。^① 对于中国祖先所用的语言，他的能力仅限于对广东话的能

^① 参见2014年2月27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骆家辉告别中国：我是百分百的美国人》<http://cn.wsj.com/gb/20140227/rlw184544.asp>。

听却不能说,^①他既不会说普通话(这一点还不如他的前任白人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更不会认中国文字。

骆家辉这样的身份定位、文化认同、语言能力及相应的言行表现,让对他抱有亲人般期待的中国同胞大失所望,由失望而变得恼怒,从而产生了报纸舆论上的恶言相向。撇开骆家辉为推动中美关系做出的实际贡献不谈,即使从基本的外交常识来看,或者以中国人看待非华裔的美国大使的眼光来看,身为美国大使维护美国利益也是理所当然的,骆家辉不应该遭受那样的批评责难。但是,在中国文化“血浓于水”、“四海炎黄一家亲”的传统理念里,出现这样的失望、愤怒与批评又显得相当自然。当然,这种只是“从中国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看中国”的愤怒和批评(周有光 2015; 资中筠 2013),除了在自己的舆论范围之内宣泄情绪,对于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先进文明的大局是有害无益的,与“把中美关系搞好”的根本目标也不相吻合。在这里,跨文化的观念差异和思维方式的问题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又一次纷扰。

四、“美籍华人”、“华裔美国人”与“ABC”

中美两国大众理念中对于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的认知差异广泛体现在跨文化交际的诸多方面,这种差异也系统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对于拥有美国国籍的华裔居民,在中文里准确的指称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美籍华人”,对应的英文是 American Chinese;另一个是“华裔美国人”,对应的英文是 Chinese American。^②这两个短语的不同表面上看只是词序的颠倒,但这一颠倒带来的含义差别很大。叫“美籍华人”,隐含的意思是虽然你入了美国籍,但你还是华人,是中华大家庭的远方游子,不管你走到哪里,在外多久,都是祖国牵挂的孩子;同时,你也被预设为心怀祖国,处处以祖国的利益为重,在国与国之间的是非面前维护祖国的尊严,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与祖国民众相认同。在第二个叫法“华裔美国人”之中,“美国人”变成了中心词,“华裔”只是定语。相应地,这一表述隐含的意思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华裔标示的是你的血统,你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有天然

^① 《骆家辉:“广东话识听唔识讲”》。《侨报》2011年11月4日B5版。

^② 还有诸如“美国华人”、“美国华裔”等其他表达,但其内涵都不确指拥有美国国籍的华裔居民,有时也指未入美籍但拥有长期居留身份即绿卡的华裔居民。

的情感连接；但是，在社会身份和文化归属上你首先是一个美国人，文化与精神素养上依从的主要是美国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理念，而对于祖籍国的社会文化与大众观念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经验与体认。

不难想见，基于“血浓于水”、“四海炎黄是一家”的深厚久远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美籍华人”的表述方式比“华裔美国人”与中国民众的思维心理更为契合。反映在语言运用上，这两个短语的使用频度差别很大：在北京语言大学150亿字规模的BCC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短语“美籍华人”出现了729次，而“华裔美国人”只出现了37次，前者是后者的近20倍。“美籍华人”的使用频度远高于“华裔美国人”，这正是使用汉语的中国大众对美国华裔的亲情认同的真切体现。^①与中文的情况相对照，在有5.2亿词次（word token）规模的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中，与“美籍华人”相对应的短语American Chinese只使用了28次，而与“华裔美国人”相对应的Chinese American则使用了732次，后者的使用频度是前者的26倍多。^②

这两个英文短语与相对应的中文短语在使用频度比上的颠倒性反差，所反映的正是中美两国大众思维中对于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的认知差异。与中国“四海炎黄是一家”的观念相比较，美国文化和大众思维里的祖籍观念及移民与祖籍国的亲近情愫则显得相当单薄。语言的使用是思维观念的直接映照。不同于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超稳态文化传承和根深蒂固的故土情怀，美国短暂的移民建国的历史和现代社会频繁的居所搬迁与人口流动当是美国文化中祖籍与故土观念相对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平权运动的展开对本已淡薄的祖籍与故土观念又带来进一步的冲淡。

前面讨论的关于骆家辉华裔身份所引起的纷扰，其实就是把他看作“美籍华人”还是“华裔美国人”的问题。中国民众在潜意识里习惯性地把他看作“美籍华人”，而骆家辉的自我定位是“华裔美国人”。^③中国媒体上的诸多歧见由此

① BCC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网址为<http://corpus.byu.edu/coca/>，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2日。

② 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的网址为<http://corpus.byu.edu>，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2日。

③ 他自己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为自己的华裔血统感到骄傲……但我是个百分百的美国人。”见2014年2月27日《华尔街日报》。<http://cn.wsj.com/gh/20140227/rlw184544.asp>

而生。

对于骆家辉和美国的其他华裔移民，在语言里有“美籍华人（American Chinese）”这样的指称方式，但对有些族裔的美国人却不用这样的方式称说，比如不说奥巴马是“美籍非洲人（American African）”或“美籍肯尼亚人（American Kenyan）”，也不说特朗普是“美籍德国人（American German）”，而只能把奥巴马叫作“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或“肯尼亚裔美国人（Kenyan American）”，把特朗普叫作“德裔美国人（German American）”，^①虽然他们与骆家辉相似，也是父辈或祖辈移民去的美国。与骆家辉一样，特朗普总统也是第三代美国移民，他的祖父从小生长于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年轻时（1885年）也是怀着淘金梦移民美国。因此，德国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祖国”。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长大来美国求学的，因此他属二代移民，与肯尼亚的血缘关系比骆家辉与中国的关系更近一些。语言表达中有“美籍华人”而罕见“美籍德国人”或“美籍非洲人”，当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更为浓郁的家国情怀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个与“美籍华人（American Chinese）”相关的英文短语，叫 American-born Chinese 或 American born Chinese，通常使用的是简称 ABC。ABC 的字面意思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实际上指的是“在美国出生的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而不包括在美国出生而后回到中国、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其准确的英文表达应该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American。这个短语的使用也有值得注意的跨文化因素：它基本不出现在正式严谨的英语话语语境中；其使用者似乎主要是第一代华裔移民；真正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即所谓真正的 ABC）基本不自称为 American-born Chinese/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 ABC，有些华裔子弟甚至反感用这一表述来指称他们。^② 这种差别显然与美国华裔代际间社会文化归属的改变有密

① 其实连这么叫都很少，通常就是把他们称作“美国人（American）”。

② 参见英文网络论坛 Quora 上的有关讨论：<https://www.quora.com/Why-is-the-term-American-born-Chinese-used-instead-of-Chinese-American>。其中一位署名 Joanna Louie 的美国华裔子弟 2016 年 2 月 13 日的留言写道：As a Chinese person born in America, I have never referred to myself as an American born Chinese. I've always considered myself Chinese American. The only people I know who say American born Chinese to others are those who grew up in Asia.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and that many Asians who grow up in America consider themselves American.... 笔者在北加州向几位华裔二代的学生调查询问，他们的回答也基本相同。

切的关系。第一代华裔移民通常都保持对祖国原有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归属,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要传给子孙。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美国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就像骆家辉一样。与其父辈或祖辈相比,他们在身份定位和文化依从上也自然会有很大的改变。虽然他们对美国文化的融入和归属感因为种族原因和家庭的影响并不一定完全彻底,但与其父辈祖辈相比,改变是真实而且显著的——只是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及其在祖籍国的同胞对此常常认知不足,潜意识里还是习惯性地已把已经变成为“华裔美国人”的子孙后代当作自己希望的“美籍华人(American Chinese)”或“在美国出生的华人(American-born Chinese/American born Chinese)”。日常所见的一些交际误判和摩擦即产生于这一认知盲区 and 思维惯性(Collier 2015; Hecht et al. 2005)。

五、结语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搞好中美关系是多层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提出在知识上和心态上的跨文化容通是促进双边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考察骆家辉作为华裔驻华大使的特殊身份及其所经历的中美之间跨文化碰撞与冲突,文章具体展示了跨文化的认知盲区和交际误判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不必要的纷扰与障碍。搞好中美关系既需要政治领袖的远见与勇气,也需要深厚扎实的学术支撑。美国研究中心是服务于发展中美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以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思维对中美之间各层面、各类型的交流互动进行基础性、人文性的学术探索,从而构建两国之间跨文化容通的学术基础,这是美国研究中心学术追求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 [1] Collier, M. J.: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 in L. A. Samovar, R. E. Porter, E. R. McDaniel and C. S. Roy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40th ed., 53-61.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2015.
- [2] Dunne, T., M. Kurki & S.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4th editi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 Fukuyama, F. :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M]. London: Penguin. 1992.
- [4] Hecht, M. L. , J. R. Warren, E. Jung & J. L. Krieger.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in W. R. Gudykunst (ed.) :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57-278.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 [5] Huntington, S. P.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M].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1996.
- [6] Samovar, L. A. , R. E. Porter, E. R. McDaniel & C. S. Roy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C]. 40th ed.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2015.
- [7] 梁霞. 国际汉语教师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立场与态度 (手稿) [Z].
- [8] 周有光. 从世界看中国: 周有光百岁文萃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9] 资中筠. 周有光文集代序. 见: 周有光文集 [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